

袁枚“性灵诗学”视域下清代女弟子诗歌传播研究

肖红梅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8月31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9日

摘要

袁枚招收女弟子编有《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是其“性灵诗学”理论的延伸与实践。通过选本评点，商业出版，湖楼诗会与女弟子家族唱和，书信往还多路径，建构了以女性为主的诗歌传播网络。此举使女性诗歌由私人书写进入公共视野，虽受礼教者的批判，但有利于推动女弟子文学群体意识的形成，使得性灵诗学得以广泛流传，并给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带来活力。

关键词

袁枚，性灵诗学，女弟子群体，诗歌传播

A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Poetry by Qing Dynasty Female Disci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an Mei's "Xingling Poetics"

Hongmei Xi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3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9, 2026

Abstract

Yuan Mei recruited female disciples and compiled the "Selected Poems of Female Disciples from Suiyuan," an extens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is "Xingling" (spiritual essence) poetic theory. Through annotated anthologies, commercial publishing, poetry gatherings at lakeside pavilions, poetic exchanges with the families of his female disciples, and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he established a poetry dissemination network centered on women. This initiative brought women's poetry

from private writing into the public sphere. Although criticized by Confucian orthodoxy, it helped foster a literary group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female disciples, enabled the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Xingling poetic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vitality of Qing dynasty women's literature.

Keywords

Yuan Mei, Xingling Poetics, Female Disciples, Poetry Dissemi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晚明，秦淮青楼女子中很多都有诗画才能，而那个时代的良家女子反而被禁锢于家庭而在诗画方面显得普通。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良家爱读诗书、吟诗作画的女才子渐渐多了起来，“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1]这句就能窥见清代女性文学之繁荣。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2]收录了1262名女诗人。清代女诗人大量涌现，与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开放有关，也与少数思想开放的文人大力倡导有关。而袁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很值得一提，他在辞官后公开招收女弟子，吸引席佩兰、孙云凤等数十位江南女性从学，创建了随园诗派，并且编纂《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是清代第一部专门辑录自家女弟子作品的诗歌选本[3]。以往的封建教育观阻断了女子受正规教育的途径。女子不可以科考、求功名、不可以介入政治，甚至认为女子不该作诗。但袁枚不同意“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袁枚的这一行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更以“性灵诗学”为纽带，构建起从闺阁到文坛的诗歌传播网络。

袁枚招收女性学生的行为不仅拓宽了她们的学习途径，还反过来通过这些女生进一步扩展了性灵诗学的听众群体，从而促使诗歌逐渐融入到市民生活中去，他把女性诗歌作为传播“真性情”文学观点的媒介，在当时社会文化实践中引起了一场围绕着女性才华和礼节准则的激辩。

2. 招收女弟子：性灵诗学的传播主体建构

袁枚居“乾隆三大家”之首，引领了清代的“性灵”诗风，而袁枚招收女弟子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其“性灵诗学”理论逻辑的延伸。他在《随园诗话》中明确提出：“诗者，人之性情也。”认为诗歌应“自抒己见，不随人脚跟”[4]。而女性这一性别天然就有更细腻更深入的心理感受，并且女性长期被排除在科举功名体系之外，其创作更少功利性，更易摆脱“代圣人立言”的束缚，天然契合“独抒性灵”的主张。袁枚正是看到这一点，将女性视为性灵诗学“去精英化”的关键载体，通过女性的闺阁传播、市民化传播，让诗学走出文人圈层，走向大众。

更为关键的是，袁枚对女性才能的认可具有现实依据。清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市民阶层崛起，女性教育逐渐突破“女红”范畴，一些大家世族，或为子孙求仕，或为附庸风雅，皆以读书作诗为荣为乐，形成书香门第。其中就培养了不少好学好诗的女子。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乾隆年间苏州、杭州等地已有女性诗社出现，如张允滋等发挥主导的“吴中十子”诗社，并编纂《吴中女士诗钞》[5]。袁枚敏锐捕捉到江南女性教育普及、诗歌创作兴起的文化趋势，同时意识到传统传播模式的局限，于是以“公开招收女弟子”为突破口，将分散的女性诗人整合为有组织的文学群体，为性灵诗学的传播搭建平台。

袁枚收女弟子有利于诗歌传播，要招收女弟子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开始关注，据《清稗类钞》师友

类记载,消息传出后,“一时江浙女弟子各以诗来受业”[6]。清代虽有钱谦益教授柳如是、毛奇龄指导徐昭华等案例,但均属于私人交往,未形成公开的师徒关系,袁枚以较规范方式的收女弟子方式,将女性诗歌创作由“私人行为”升格为“文化事件”,引起士人、市民甚至三教九流的关注。

女弟子群体的存在,使性灵诗学从精英圈层走向大众视野,为后续传播奠定基础。

3. 选本与评点:女性诗歌的经典化建构

选本作为文学经典化的中心工具,它对主题的选择常常能够直观地体现出编选者对于文学的态度。袁枚所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有28位女弟子的几百篇作品,不仅是清代最具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女性诗歌选本,更是对中国传统女性书写样式的颠覆。

在袁枚之前,女性诗歌的选本多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题材往往局限于“闺怨”、“思妇”或“咏史鉴古”等领域,情感表达多指向幽微、隐忍的私人空间,在诗作中往往映射出处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下的女性,但是袁枚倡导“性灵说”,反对摹拟古人并且强调“即事咏怀”,这一中心诗学观点在他对女弟子诗作的挑选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袁枚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的界限,广泛地收集了咏物、旅行、绘画以及描述生活细节的作品,从而引导女性的创作从狭窄的绣楼扩展到广袤的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并努力展示女性独特的生存环境,摆脱男性的视角束缚,就如席佩兰的诗作,处处可见这种“眼前好景”的性灵之趣。例如《论诗绝句》更明言“沉思冥索苦吟哦,忽听儿童踏臂歌。字字入人心坎里,原来好景眼前多”[7],主张诗意就在日常所见之中。这种创作实践,正是对袁枚“独抒性灵”主张的生动呼应——女性的诗歌不必囿于“闺怨”的传统题材,而可以从身边琐事、眼前景致中发掘诗意,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书写真实性情。

除题材上的扩展外,袁枚对《随园女弟子诗选》的评论也表现了极富现代意识的评判标准,他重视每个人的独特性来避免“千人一面”,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之中,人们往往期望女性诗人们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阴柔之美”或者“婉约之姿”,而这一刻板印象却在抹杀着女性这一创作主体的创作自由。袁枚对此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在女性诗人身上竭力崇尚有别于一般情感且性格鲜明的面貌,并通过强调个体差异来传达“女性诗歌也可以多样化”的先锋思想。

在选本评点方面,袁枚对女弟子诗作的评判,既有精准的审美判断力,态度也颇为宽和。对待金纤纤,他能够捕捉到其诗不加斧凿的灵性,看重文字里流露的天真本色,誉其为“吴门闺秀之祭酒”。其《夏夜即景》云:“绮阁玉玲珑,荷香送远风。水云凉不去,林月曙当空。罗扇裁秋怨,兰缸烬夕红。夜阑犹笑语,暑气散帘栊。”[8]全诗描摹夏夜闺间实景,不堆砌哀婉愁思,以浅净清丽的语言书写眼前日常情态,正是这种自然真率的性灵风貌。而品读孙云凤的作品,他又能越过女性身份的固有印象,读出诗作内里豪迈的一面,点出其笔下独有的“丈夫气”。其《山行》写道:“客思西风里,车尘暮霭间。虫声黄叶路,人影夕阳山。鸟去一何速,我行犹未还。临溪羡渔者,幽意独闲闲。”[9]此诗以山行羁旅入题,取景旷野旅途,将客思寄予西风远山之间,跳出闺阁庭院的狭小书写边界,清旷开阔,无脂粉柔靡之态。即便是归懋仪这般才气凌厉、笔力锋芒外露的诗人,袁枚同样不吝褒扬,直言其诗“雄伟绝不似闺阁语”,并未拿传统礼教下的“妇德”尺度,去苛责她们创作风格里那些突破闺阁范式的地方。

袁枚在编选、评点《随园女弟子诗选》的过程中,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创作的固化认知,展现出女性写作本就具备的丰富可能性。他将这批风格迥然的女弟子纳入性灵派门下,既消解了文学层面的性别偏见,也借此进一步阐发自身“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追求。借助选本这一媒介,袁枚搭建起面貌丰富的女性文学图景,读者不再笼统地把这些作者归为“闺阁诗人”这一模糊群体,而是能够看见每一位写作者独有的面目。不过选本终究属于静态的文本载体,真正令女弟子的诗作走出书斋、获得更广传播的,还是袁枚所推动的各类现实层面的文学活动。

4. 诗歌的互动与传播

4.1. 袁枚主导的传播

从诗集编排上看袁枚运用了很有魅力的“诗加评论”形式，在每篇所选诗歌后面常会附加袁枚言简意赅、妙趣横生的点评，这类点评既是点拨诗意，也像是师生之间的闲话或者朋友圈子之间的交流，大大降低了阅读门槛和提升阅读趣味性。

从刊刻传播的层面来看，袁枚主要依靠自资刊刻，结合当时的图书商业渠道来推广著作。据蒋寅考察，《随园诗话》刊行之后翻刻盛行，至清末至少已有三十多种刊本，另有数量可观的钞本、删节改编本流传，在当时非教科书类读物中极为罕见^[10]。凭借袁枚本人在文坛的巨大声望，加上已经发展成熟的出版流通网络，《随园女弟子诗选》一经刊行便收获广泛关注，一跃成为清代影响力最大的女性诗歌选本之一。

这一热销并不限于江南一带，由于清代运河水系发达，书商网络积极，此书很快打破地域局限，书商借助大运河航运优势向北京和广州两大文化重镇发送图书，在某些偏僻私塾及闺阁内，此选本已成为妇女竞相借阅之样板。袁枚在此高效商业传播网络下既树立起女性文坛的宗师地位，又把“随园女弟子”这一文学品牌推广至全国各地，并形成横跨地域和圈层的传播领域。

4.2. 西湖湖楼诗会的传播

除了通过出版和发行来达到广泛的传播目的外，袁枚也深刻地认识到“现场感”所带来的影响力，他所组织的西湖湖楼诗会使诗歌传播由纸面上向现实中扩展形成了一道新的传播景观。

雅集作为清代诗歌流传的中心场景，在此诗会上，文人雅士们可以交换各自观点，探讨诗歌创作并推广自己的作品，袁枚征召为女弟子以后一共举行了两次有名的“湖楼雅会”。

第一次湖楼雅会举行于乾隆庚戌年春。彼时 75 岁的袁枚回杭州扫墓，女弟子孙云凤邀十三位女士，大会于西湖孙氏宝石山庄之湖楼，各以诗画为贽。第二次湖楼雅会则在乾隆壬子年春。袁枚重游天台山后，归程途经杭州，再次召集女弟子举办诗会，此次到会者共七人。

袁枚举办雅会，不仅有女弟子，还另有王文治等男性文人参与，《云根山馆诗集》^[11]可作为佐证，据该书出版说明记载，稿本中包含袁枚、王文治序，赵翼题词，以及鲍之兰、鲍之蕙等袁枚女弟子的题诗。在诗会期间，众人互相吟诵作品，形成“口耳相传”的传播链。据时人记载，诗会结束后，杭州市民争相传抄女弟子诗作，一时传为佳话。口头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使女性诗歌迅速进入公共视野。

在诗歌雅会上，袁枚通常以“即景咏怀”为题目，要求作者在现场进行诗歌创作，这一创作方式使作家从雕琢中解放出来而直露“性灵”，例如他的女弟子孙云鹤就有过即兴赋咏的作品。即兴创作既增强了诗会的趣味性，又通过对“现场感”的强化来深化作家的印象和加强传播的力量。

4.3. 女弟子作为中介进行传播

雅集带来的诗学影响，并不会随着聚会落幕便就此消散。这些亲身受教于随园的女弟子，本身就是性灵诗学的接受者与实践者，她们又主动把这套诗学理念，融入家族酬唱、书信往还与个人文集之中，成为一股绵延不绝的传播力量。

不少女弟子婚后，便以诗歌唱和的方式，把性灵诗学带入家庭内部。譬如席佩兰出嫁之后，常和家中女性亲属李秀、谢翠霞等人诗文往来，她的《长真阁集》就留存了大量与家族闺友的酬答篇章^[12]。这些诗作不只是个人生活心绪的记录，更是闺阁之中以诗传家的鲜活实例。借由家族圈层内部的诗歌交流，性灵诗学得以走出随园这一方小天地，渗透到更广的社会生活当中。

女弟子与袁枚、其他文人之间的书信，同样充当了重要的传播载体。袁枚与严蕊珠等女弟子探讨诗艺的文字，多保存在《随园尺牍》一类文献里，其中满是诗作评点与创作指点。这些信件又会在女性亲友之间辗转传观，进一步扩充性灵诗学的接受范围。书信兼具私密与针对性的特质，也让诗学理念的传递更有深度。

正是依靠家族唱和、书信往来等多重路径，性灵诗学从随园向外辐射，扩散至江南乃至更广的地域，编织出一张以随园女弟子为核心的诗歌传播网络。

5. 女弟子群体诗歌传播效果的社会反响

5.1. 礼教者的批判

袁枚广收女弟子的举动遭到不少传统士大夫的猛烈抨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妇学篇书后》中言辞激烈地批判：“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13]。在他看来，袁枚这类所谓“无行文人”，是在用异端说辞蛊惑闺阁女子，造成的危害“烈于洪水猛兽”。他将袁枚的传播实践视为对礼教的公然挑战，认为女性参与诗歌创作会导致“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

但恰恰是这些非议，反过来印证了袁枚传播策略的成效。章学诚的批判本身，便变相承认随园女弟子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足以见得性灵诗学已经拥有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力。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反对者的攻击大多落脚于道德伦理层面，而非文学艺术本身。这也说明，袁枚的相关实践，已然对传统性别秩序赖以维系的文化根基构成了冲击。

5.2. 女弟子群体意识形成

女弟子不但个人创作作品，还以评点、唱和、编选诗集的方式，形成特殊的女性诗歌话语群体。评点往来促使女弟子之间互相切磋、彼此认同，构建起超血缘、跨地域的文学交往，这种文学群体意识，使她们面对外界非议时能够相互支撑，以创作实践坚守性灵诗学的创作理念。

席佩兰与同门姐妹的交往，便可见这种群体意识。女弟子孙云凤、孙云鹤姐妹与席佩兰多有唱和，孙云鹤在《沁园春·题佩兰女史拈花小照》中写道：“韵写乌丝，神传粉本，人在盈盈一水间”，以清雅之笔描绘席佩兰的风姿才情，透露出女弟子之间互相推重、彼此认同的情谊。在她们眼中，席佩兰已被推尊为随园女弟子中的佼佼者，这种来自同辈的认可，构成了女弟子自我认同的重要维度。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说：“余女弟子虽二十余人，而如蕊珠之博雅，金纤纤之领解，席佩兰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闺中之三大知己也。”。这番评语，不只是对几位女弟子才学的充分肯定，也流露出来二人之间超越普通授受关系的师生情谊。对这些女性创作者而言，诗歌写作带给她们的，远不止诗艺层面的长进。她们不再是传统语境里沉默被动的“他者”，而是拥有才情与见识，能够主动抒发内心的独立写作者。

这份经由创作而生发的自我认同，与礼教卫道者的激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外界的责难愈盛，女弟子们便愈是以笔墨作出回应，借诗作证明：女性的才情绝非世风败坏的祸源，恰恰相反，它是人的真情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合乎性情本真的诗意表达。正是在这种“批判-传播-再批判-再传播”的往复循环之中，性灵诗学在种种争议之下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在清代诗坛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6. 结语

袁枚以性灵诗学为核心，从选拔女弟子，编辑选本和多元传播三方面建构以女性为主体，男性为主导的诗歌传播网，该网既使得女性诗歌由私人领域进入公众视野，也使性灵诗学由精英化向大众化发展，又给后代妇女文学之流传树立了一个模式：依附于选本，并且以社群作为媒介，在争议中不断发展，它

的存在虽然没有完全推翻传统的性别关系,但是这种跨界的创新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多样性和活力的同时,还为当代女性文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 [1]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5.
- [2]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326.
- [3] (清)袁枚. 随园女弟子诗选[M]. 刻本.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 [4] (清)袁枚. 随园诗话[M]. 顾学颉,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835.
- [5] (清)任兆麟, 辑, 张滋兰, 选录. 吴中女士诗钞[M].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 [6] 徐珂. 清稗类钞: 第八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7] (清)席佩兰. 长真阁集: 卷四[M]. 刻本. 清嘉庆十七年(1812).
- [8] (清)金逸. 瘦吟楼诗稿[M]. 清嘉庆刻本.
- [9] (清)孙云凤. 湘筠馆诗二卷词二卷骈体文一卷[M]. 清嘉庆十九年杭州爱日轩刻本.
- [10] 蒋寅. 清代诗学史(第二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388.
- [11] 左塘. 云根山馆诗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 [12] (清)席佩兰. 长真阁集: 卷一[M]. 刻本. 清嘉庆十七年(1812).
- [13] (清)章学诚. 文史通义(全二册) [M]. 罗炳良,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876-877.